



# 「士」至「新士」：論皮錫瑞的西學接受

**Transition of Scholar: A Study of P'i Hsi-jui's Perception on  
Western Learning**

王智霖

**ONG ZHI LING**

**15ALB03424**

拉曼大學中文系

榮譽學位畢業論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 「士」至「新士」：論皮錫瑞的西學接受

**Transition of Scholar: A Study of P'i Hsi-jui's Perception on**

**Western Learning**

王智霖

**ONG ZHI LING**

**15ALB03424**

拉曼大學中文系

榮譽學位畢業論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 宣誓

謹此宣誓：此畢業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  
無論是書面、電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於注明具體出處，並詳列相關參考書目。

---

姓名：王智霖 ONG ZHI LING

學號：15ALB03424

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論文名稱：「士」至「新士」：論皮錫瑞的西學接受

學生姓名：王智霖

指導教授：方美富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本文以傳統讀書人皮錫瑞《師伏堂日記》為中心，探討其日常生活狀態以及閱讀活動所展現西學接受下變法思想的形成過程。透過私人記載的日記，得以審視處在大變動時期下處於邊緣的傳統讀書人調適以面對西學衝擊的挑戰——外在現實嚴峻所帶來的存亡危機，內在文化價值核心的轉易，甚而個體自身所處知識階層所存有的憂患意識——無不圍繞著特有時代脈絡之下而得以開展。欲深入了解到思想世界的構成，既需要關注時代對個體的驅動，亦得注意日常生活狀態所反映的每日經驗，方得以追溯思想「轉向」的軌跡。傳統如何過渡至新知，舊有思想透過什麼中介以形成轉向；無法斷裂的傳統舊學（中學）資源又是如何影響了新學（西學）的接受？本文正是把「過程」與「轉向」的脈動，作為研究論析的關注重點。藉由末世傳統知識人皮錫瑞的《師伏堂日記》所展現生命歷程的思想變化，以閱讀接受的角度來建構屬於這一群體歷史敘事的其一面相，叩問邊緣讀書人在過渡時代中的意義求索。

**關鍵字：**皮錫瑞、轉型時代、清末士人、西學接受、變法思想

## 致謝

簡單直接的寄語：「誠謝陪伴在身邊的家人親戚師長朋友們，愿福壽安樂如意自在心悅喜樂，每日安好。」蓋狂妄之人無有安身立命之處，多得出現在生命的各位，才能有「王智霖」這麼個「存在」安頓於此，寫下寥寥真情亂語。

時光彈指瞬逝，宛若華胥之夢，此文亦在不知不覺間，填上了數十頁的空白，靜待翻章，迎接新生。雙親兄長傾之所能，放寬胸襟，任賤子愚弟遨遊尋夢。聚散逆旅，一事無成，尚未自立，無以回報，惟而今終能放聲親言：那位過去帶來無數操心與擔憂的孩子，還是如你們所願般，該是時候進入這天地間。

生性懦弱而狂傲，如籠中之鳥，盤旋在小小的牢籠中，只為找到一個得以「立」的支點，確切感受那自身存於世界的「證明」。大學四年，幸遇方師，於師於友，不嫌散漫愚昧，深得盡責盡心之恩，方能彷徨迷失之際，找到一條繼以匍匐的道路。一路以來，多失先生期許，負荆萬愧。師生之情，永存於心。

曾相信一個既定的「劇本」，曾相信世界繞著自身「運轉」著，曾相信自身的存在是無意義的——眾多的「相信」集結而成的，不過為一個「空」的軀殼。幸得零落的片片花瓣輕柔地在空蕩的心靈間蕩起小小的漣漪，留住了即將消散的寧靜。終究「命運」是有趣的，或停止本該停下的腳步在仰望和俯視之間，盡一生最大的溫柔，努力地活過二十一載，盡自己可能散播存在的證明與意義，總能好好地誠心地去愛去尋找去接受並抓住珍惜難得的粉藍色幸福。

中文系這一章節，也該時候落幕。人生如永無止境的史詩，我仍在尋找真正的答案，以及屬於「我」的故事：「為何而生？生而為何。」以上。

#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謝	iv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2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5
第四節 研究難題	6
第一章 傳統的轉向	8
第一節 「士之日常」	8
第二節 由「舊」轉「新」：甲午衝擊之下的思想轉向	13
第二章 轉型時代下的未竟之業	19
第一節 西學接受的變法思想	20
第二節 「復興」與「啓蒙」的思想資源	24
第三節 新舊之間的矛盾中間派	32
結語	38
引用書目	40

# 緒論

晚清的中國，處在傳統規範與秩序皆受到強烈衝擊的「大變動時期」。激蕩的時代洪流中，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至現代，承接舊時代的遺緒，開啓了現代化轉型的進程。本文的構想乃出於對轉型時代「舊」與「新」過渡裂縫下個體思想轉向的思考，著眼思想的接受以及成型的軌跡。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這一時期的研究，張灝提出「近代中國的轉型時期」（The Transi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a）的理論架構來剖析近代中國從「甲午」到「五四」（1895-1920）歷史時期的突破性巨變，聚焦於「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誕生、文化取向危機（Orientation Crisis）的出現以及新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的形成（張灝，2010：134-152）。轉型的挑戰使得中國社會整體，尤其是擔當四民之首的士大夫、讀書人階層需正視而今秩序失衡崩潰的現實，其價值世界不免地面臨重塑調適的過程。這一時期知識人的思想轉型研究對象往往是「中心勢力的顯性人物」，如張灝所作《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一書中主要研究對象為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與劉師培四人。

他們皆是那時期思潮的領軍代表人物，扮演著思想界的「中心領航者」，代表時代改革的響亮聲音。

中心的奏曲亦需來自於四方的和聲，方能形成一個多元紛繁的合唱。既如眾星拱月，星群固然失色於月，卻是烘托中心點的重要存在。無可否認的，相對於「中心」主導歷史軌跡的影響力，處於「邊緣」地位的知識人們的思想與影響力均為一般，不足從根本上形成思潮興盛的大敘述。自他們於過渡時代中的思想所反映出的，正是如時代情境一般地處於「過渡」知識階層的「另一種」聲音。故此，本文將目光放在未能走在時代前端，卻深受時代的變動所影響，介於傳統與新知之間的「中間人」——處於舊時代與新時代過渡間的傳統知識人，面對中國歷史轉變時期的衝擊——內在的心靈調適與外在知識接受雙重化合之下，進而「轉向」構成成型的思想世界。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要研究思想活動的軌跡，其中一個基本方法是關注觀察對象的思想與行為/產品的互涉：或可分析語言論述與人類行動的關係，或可研究觀察對象用來再現世界和把自己再現給他人的複雜概念系統，探討再現與實踐的互文性（安娜貝爾·布雷特，2008：249）。以「行為/產品的互涉」與「再現世界和自己」的角度而論，作為「即時性私密記載」，內容較多涉及記主本身社會生活的日記是值得參考關注的材料。在歷史的書寫中，非處於中心的心聲甚少被記錄下來，或是長久以來被忽視，因此「個體敘事」的日記不啻是個人的記憶載體，也提

供一種有異於制式化說法的歷史素材——它一方面作為日常活動的記錄展現了主體個性塑造以及日常生活實踐的線性歷程，一方面既是時空脈絡下再現個體歷史行動的文本。俄國史家 Irina Paperno 強調日記不僅是個體「日常」或「隱私」的資料庫，應當作為一種日常生命史再現的寫作形式。當中的事實與經驗因經過中介（mediated）的過程，應當被視為「個體自我意識與私密性的場域」（Sphere of individual self-consciousness）和「文化實踐的核心」（Central to Cultural Practice）。她認為：

論及即時—主觀認知，以及私人—公共領域之間的相互關係時，日記創造了一個通用的矩陣，以敘述歷史和社會脈絡下的個人經歷。如此，日記可說是創造了一個「私密歷史舞台」的空間。……雖然基本敘事模板（持續性的第一人稱日記記錄）是不變的，但即時性認知（一種構思時間的方式）、主觀性認知（一種概念化的自我）與私人—公共領域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受到歷史、文化和個人的因素所影響。（Perpeno, 2004:572-573）。

日記作為一種私人記錄，除了是自我形象與價值的塑造和宣示，亦再現個體於歷史脈絡之下不同層次的，兼具個體於公私領域日常生活下的雙向建構。藉由日記研究的途徑以探討「轉型時期下傳統思想範式的轉化」的命題，即是著眼傳統過去的日常實踐所展現的思想圖景，了解個體於特定社會、歷史和文

化情境的日常敘事中，所經驗的種種事實當中所反映的轉化「過程」(process)。根據 Ben Highmore 的觀點：

如果日常是我們最熟悉且容易識別的，那麼當那個世界被我們**不熟悉的事物**所擾亂和破壞，將會發生什麼？如果「新的衝擊」引起了日常生活核心的震動，對於日常這個熟悉且容易識別的感覺又會發生什麼變化？在現代性的框架中，日常變成了一個動態過程的背景：使不熟悉的事物變得熟悉，還逐漸對習慣的潰決習以為常和努力融入新事物，以便調整以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 (Highmore, 2002: 2)。

海默爾指出現代性日常生活所具有，接受與調適不熟悉事物的特征。「陌生變為熟悉」的動態過程，無疑是作為一種「新的衝擊」，引起了日常生活的變化。現代性不只體現在於生活方式和社會變遷所展現的時代特征，也內化到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一種「時代的態度」。誠如福柯所說：「一種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願的選擇，一種思態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米歇爾·福柯，1998：430）。在這洶湧的潮流之下，得到啓蒙的自覺個體走出了封閉的傳統日常，因日常選擇而展現出來行為實踐與思想面貌的調適「過程」，是否能夠反映生命歷程思想「生活化」於過渡時代傳統與新知交匯化合下的價值意義呢？近世中國的過渡時代所表現的「不熟悉事物」對於此前生活在傳統日常狀態下的個體，毋庸置疑便是西學浪潮襲來而擴展的知識世界。對於未能進入政治仕途，亦無出國遊歷或習得新語言新知識的嶄新思想資源——散落於

社會，重複著舊有框架傳統讀書階層的一份子，經典閱讀是他們最熟悉的事物。唯有通過改變閱讀的習慣與模式，方能推動和引導生活-思想世界的調適，引發認知觀念的轉向。

進入本文視野的研究對象——皮錫瑞正好符合前文所述的各個條件。他晚年所作《師伏堂日記》詳細記載了其最後近二十年生命歷程的日常點滴。日記不純為流水賬的瑣事，較多閱讀的記錄，繼之以閱讀感受與心得，可謂是建構與呈現其自我思想的敘述載體；當中敘述所反映的「邊緣傳統讀書人」關注事物、思想情感、價值觀念以及日常的行為參與，便是個體於時代蕩流濺起的細細水花，留下了可供參閱的歷史碎片。

###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當今學界針對皮錫瑞展開最全面研究的，首推吳仰湘。吳氏所著《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二書詳細且深入考證與分析了皮氏的生平和思想，但較少提供「過渡時代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變遷的縮影」的歷史視野。中文專著如丁亞傑《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潘斌《皮錫瑞學術研究》，美國 Stuart V. Aque“*Pi Xirui and Jingxue lishi*”，以及諸如研究成果，都圍繞「經學」與「變法思想」為中心進行探討。相關文章於史料的運用上除吳氏以外，多參照自《清皮鹿門先生錫瑞年譜》以及《湖南歷史資料》選刊丁酉（1987）初冬至庚子（1900）年時期的日記片段截取，未能真實反映皮錫瑞思想轉變的「過程」。

按皮氏早年依循舊有傳統框架，執著科舉，後因科場連挫，遂決意功名，以講學和著述終老的人生歷程來看，可將他看作是晚清巨變下不得志傳統士人的典型。其思想世界的形成並不是單線貫穿，而是於不一樣的情境中，經由重整轉型的糅合與調適，方慢慢形成一一變法學術立場上堅守「復興古學」，政治與教育態度上著重「啓蒙新知」一一的思想基調。理解與分析這一「過程」被引發的肇因與影響，方能展開關於皮錫瑞由傳統步入新知的西學接受的討論。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提醒我們，個案研究需注意自傳性材料所記錄的閱讀活動對觀察對象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才能探究閱讀活動所承載的意義（羅伯特·達恩頓，2010：151-152）。李仁淵也強調閱讀史的研究需將「讀物-閱讀-讀者」的閱讀歷程放到特定時空的社會脈絡當中，探討經由讀者閱讀的傳播系統所產生的意義，於特定時空社會中的效用（李仁淵，2009：233）。承上，本篇論文嘗試通過閱讀碎片回應的，旨於幾點思考：作為典型浸染在傳統世界大半輩子的皮錫瑞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拋開成見，逐漸開放心態以接受作為新事物的西學？完成思想轉化以後的他又是如何看待周遭世界？日常生活的改變乃至思想的轉化又對其人生軌跡帶來怎麼樣的影響？

#### 第四節 研究難題

歷史的答案絕非是開端與完結的因果定調，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亦如是。或許正如依然處在「過渡」般徘徊在新舊中間的複雜定位，方得用前後循進的微觀視野，來探究行動實踐而反映的思想變化。這毋寧或陷入以後世

之眼光評斷過去的偏頗之失。如此不免會夾雜著「後知之明」的先驗性，將歷史的發展過程視為定型的文本，未能深入皮錫瑞日常狀態的敘事，淪為生平歷程的一般性泛論。我們循前人的記錄與敘事，追尋遺留在過去的聲音。迴聲如華胥之夢，璀璨且縹緲，靜息星辰滄溟的永夜。點亮微光，爬伏著一條超脫時空的文字之絲，歷史交錯之塵網被一一編制。我們回溯、思索、建構，終而找到了「他的」「故事」（His-Story）。以日記敘事為觀察的媒介，整理當中活動映照出的思想脈絡，只為解釋如此時代之下，該何以自處的叩問。

# 第一章 傳統的轉向

新式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文化如何建構起來，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中國近代轉型時代面臨「西方衝擊」的挑戰，而引發「轉變」與「重構」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使得晚清讀書人走出傳統，開始求索陌生的新學知識。固有與外來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反映了舊有世界向新世界過渡的轉向。繼承古典底蘊的日常生活的狀態與價值——因為什麼以及如何發生，無疑是探究「過渡」思想觀念的關鍵所在。

## 第一節 「士」之日常

光緒十八年（1892）正月初一，皮錫瑞時年 42 歲，記下了人生第一則日記：

天陰。予自念不在家度歲兩年矣。前年庚寅奔喪未至，初一泊一孤洲，予有戒心，夜不能寐。去年辛卯在江右學院幕府，人皆喧呼飲博，予嗒焉若喪，悶坐無聊，改《〈關雎〉後妃之德賦》一篇，今刊入試讀者是也。今雖聚首故里，而老親棄養，幼子殤亡，悒悒無歡，

覺君子三樂，其一已不可復得。且北上在即，行當裝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在家仍不殊在客時矣（皮錫瑞，2015a：15）。

日記忠實記錄了皮錫瑞的起居生活，以及親人相繼離世的苦悶之情。長年因科考或謀事而羈旅在外，時光飛逝，在家或在外的生活樣態與感受再熟悉不過，已無多大差別。不久，他便要準備北上赴考，第十次將希望寄情考場。此番之行，皮錫瑞莫不關注科考讀物，既如時文集錄、士子考評錄以及研讀經義，且時時寫大卷白摺練字，付出相當精力。<sup>1</sup>無奈科舉受挫的困境如魅影般，始終陷皮錫瑞於無有進況的囹圄。無功名的士人和業儒，講學基於主觀願望和客觀需要才由業餘行爲變成終身職業，且往往多因家境貧寒才終身以此爲生（張杰，2003：176-178）。客觀現實的經濟壓力，令皮錫瑞不得不尋覓坐館教學的出路。如此情境對傳統之「士」的皮錫瑞而言，其閱讀世界深受舊有傳統所熏陶，自然也充滿了各類儒學的經學書籍；坐館教書的生活也不外乎日復一日地遵從儒家固有模式的經典學問。無有多大變化的地方教書生活，遂形成一個定型的生活世界，可謂是典型地方讀書人的寫照。<sup>2</sup>

---

<sup>1</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一月廿二日（皮錫瑞，2015a：20）、一月廿四日（皮錫瑞，2015a：21）、一月廿五日。（皮錫瑞，2015a：22）

<sup>2</sup> 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根據周榮德先生在1943年至1946年間在雲南搜集整理的中國士紳生活史，認爲雲南地區因地理位置的關係，西方衝擊的影響是遠遠少於其他中國地區，其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傳統階層的社會樣貌。出自於書香世家（士族家庭）的地方讀書人，教學一生收入微薄，僅夠溫飽與提供教育，維持著簡單知足的生活；接受新式教育的新一代也唯有擔當地方官才有聚財致富的機會。易言之，即使跨越數十年間，不同地區的地方傳統讀書人典型之生活樣態基本無多大變化，拘守於傳統的天地之間。詳見 *Life-Histories of The Scholar: Chairman Wang*（Yung-teh Chow，1953：145-172）。

皮錫瑞坐館教學的首要任務，便是批閱師課卷，近乎佔據於經訓書院的大半日子。因科考或家事延誤遲抵書院，還會接連批閱累積好幾月的課卷，工作頗為勤奮。光緒十八年（1892）科舉失利，皮錫瑞五月十三日抵書院，便埋首投入閱卷工作。當中，亦不乏他對學生作業所作的批語。這些批語有針對學術一二而發，如皮氏批學生蕭疏衡〈燕昭王師郭隗論〉卷曰：「伊痛詆燕昭、郭隗。宋、明以來，論者工訶古人，而不審時勢。此陋習最可惡，予擬批深斥之」。<sup>3</sup>又六月初次課卷批葛成春、舒繼芬、胡其敬〈嚴助詰田蚡不救甌論〉針對現實時勢而語：「亦能暗切時勢，通達古今，暗斥今日不救琉球、越南、朝鮮之非，不作迂闊之論」。<sup>4</sup>皮氏顯然絕非處在閉塞地方而對現實時勢毫無所知的教書人，論學常言「上下千古之識」<sup>5</sup>，倡通古今之變以應時事之實學，重視經史與當今政治時事的融會貫通。這般意識又是否能切合當今現實的局勢呢？

以認清世界局勢而言，19 世紀後期中國外患接踵而來，皮氏確實注意到境外已有侵略之勢，對此的反應依然保持著傳統「天朝上國」的意識。早在光緒四年（1878），皮錫瑞因沙俄野心伺侵邊疆，便主張屯田固邊，憤然賦詩：「煌煌大朝秉威信，流沙蟠木來羌氏。何物準夷抗螳臂，防風之戮嗟終迷」（皮名振編，1981：14-15），將己國比作「煌煌大朝」，外敵比作「螳臂之夷」，充滿敵鄙之情。光緒九年（1883）清法戰爭開打，皮錫瑞有感事詩云：「聖主如天容萬國，豈徒罷戰說銷兵」（皮名振編，1981：19）。清廷慘敗成定局以前，皮錫瑞總以「天朝之威」，主張出兵滅夷，反對和談，對清廷實力

---

<sup>3</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五月十八日。（皮錫瑞，2015a：57）

<sup>4</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六月十五日。（皮錫瑞，2015a：65）

<sup>5</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八月十八日。（皮錫瑞，2015a：99）

極富自信。光緒十年（1884），馬江海戰法軍徹底擊潰福建水師，仍認為「虬髯敢覬夫餘國，烏澗猶存裸壤民……桓桓萬里長城在，應信神州定有神」。<sup>6</sup>學生作〈始皇得聖人之威論〉云：「後世之患，不在不德，而在不威」，他亦表示認同，認為宋以後「迂遠刻深」之議論使得中國疲弱。<sup>7</sup>這般狀態誠如張灝所言，士紳階級在甲午戰爭以前大多數仍然生活在傳統的世界裡（張灝，1978：479）。自幼所學加以日常環境的局限，現時的皮氏可能注意到時勢的變化，思想卻仍無法跳脫出傳統的框架。整體日常狀態的氛圍：或批改課卷，或與友人學生交流經義俗事，或流連于他所傾心的閱讀著書，生活上則保持著貧困學人時時困擾的金錢問題與家庭糾紛<sup>8</sup>，並無任何與當今時勢共時的記載與討論，故未能深刻感受到「存亡」的危機感。

皮錫瑞閱讀活動，接近中國傳統意義上讀書以治學。就日記所示，至少於甲午戰敗的衝擊以前，皮錫瑞所閱的各類書籍，基本不離經史子集，尤其經史更佔據了皮錫瑞極大部分的閱讀時光，前人讀書札記亦是皮氏所鐘愛的。茲以光緒十八年（1892）六月為例，皮錫瑞連閱魏源《書古微》、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程廷祚《晚書訂疑》、宋翔鳳《大學古義說》、俞正燮《癸巳類稿》、毛奇齡《郊社禘祫問》《大小宗通釋》《古文尚書冤詞》、江永《禮記訓義擇言》、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

---

<sup>6</sup> 見《師伏堂詩草·感事之四》。（皮錫瑞，2015b：335）

<sup>7</sup> 見《師伏堂日記》，甲午年（1894）六月十四日。（皮錫瑞，2015a：294）

<sup>8</sup> 善化皮氏一家自皮錫瑞父親去世以後便迅速中落，皮錫瑞庶母擔當一家之主，主持家政，卻也無可改變家境日漸衰敗的窘況。光緒十八年（1892）十月，皮錫瑞歸湖南之時，日記便多記載家中光景萬難欲出售祖產、賬目透支之情況，以致感歎「自歸家後，橫逆之聲日至於耳，令人思客游之樂」。（皮錫瑞，2015a：115-127）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便分析家產，家境萬難。（皮錫瑞，2015a：382-384）

吳文正《三禮考注》《吳梅村詩集》等書。閱讀經史之餘，對書籍略作數評，已是生活常態。<sup>9</sup>透過閱讀而有所感發的心得與感想詳細呈現於日記當中，也常常成為皮錫瑞著書的靈感源頭。如讀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二書之精之謬，遂萌生作《古文尚書疏證辨誤》的想法，以補疏前人之不足。<sup>10</sup>此外，皮錫瑞的閱讀習慣亦會隨科舉進行調整。他於癸巳年（1893）九月十一知曉高中科舉者用《管子》《禮》《公羊春秋》者尤多，認為「近日風氣所驅，經與子其大宗也」。<sup>11</sup>十月初二始閱《莊子》（皮錫瑞，2015a：214），初九至同文書局買《廿二子》《經餘必讀》。<sup>12</sup>然往後歲月所讀非儒之子書也唯有《韓非子》一部，可見其為科舉而閱讀的功利之用。<sup>13</sup>

上述日常狀態與閱讀活動間接反映了西學於皮錫瑞而言，衝擊是極為微小的。或因當下西學知識對於皮錫瑞而言，未有切合現實所需的價值，故並未能給予積極反應（接受或抗拒）的重視。德國史家 Alf Lüdtke 指出，日常生活中重複的定調，將使得思維和行動都變得務實，而社會強加的刺激，被個體感知和處理為「利益-需求」和「焦慮-希望」的調適形式時，將同時導致「世界」的轉向（Lüdtke，1995：5-7）。換言之，當主體感知到來自於外在社會場域強烈

---

<sup>9</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六月初二日：「予始見默深先生《書古微》頗多武斷，將《召誥》、《洛誥》篇文任意顛倒，蹈宋人改經陋習，又引《書序》力辨周公無稱王之事，皆宋人唾餘，予意甚不然之。今見劉禮部《尚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乃知其說皆出陽湖莊氏。莊氏經學大師，不明謬妄至此。予所以云國朝經師治《尚書》皆未有得要領者也。又見程綿莊《晚書訂疑》，力辨武王不蒙文王受命之年，其說皆謬。」（皮錫瑞，2015a：61）

<sup>10</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六月十七日。（皮錫瑞，2015a：67）

<sup>11</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九月十一日。（皮錫瑞，2015a：208）

<sup>12</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十月初九日。（皮錫瑞，2015a：216）

<sup>13</sup> 見《師伏堂日記》，辛丑年（1901）三月初七日、四月初五日。（皮錫瑞，2015a：1342、1352）

得足以改變單調日常的刺激，將會形成一種重新調適的動力。皮氏日常實踐著古有傳統的價值，自身則無力或無意地以現實世界為導向展開陌生般的自我學習，從而缺乏一種需要「轉向」的憂患意識。直到甲午戰爭的消息進入皮錫瑞的視野，現實存亡之感充斥著日常生活的樣態的時候，求索能夠實用於改變當下的資源，便成為皮錫瑞首要思考的要點，漸漸啟發了思想轉向的過程。

## 第二節 由「舊」轉「新」：甲午衝擊之下的思想轉向

皮錫瑞於南學會第十二次講學，把士人分成五類：鄉曲之士、都邑之士、遊歷之士、讀書明理之士和好學深思之士，以此作為士人見聞多少與開通程度的標準<sup>14</sup>，而這恰好就是其自身思想轉變的寫照：被動地透過與友人談西學來接觸外來事物，再至主動地廣泛參閱各種西學書和報刊，得以擴展其思想境界，能夠坦然地接受與了解陌生嶄新的西學知識。

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和日常世界，不僅日常生活未有多少現實的討論，於中國與世界的局勢，抑或對於逐漸蓬勃展開的追求引進西方技術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是無所接觸或存在著認知的偏差。甲午以前的皮氏雖有接觸報刊，所帶給

---

<sup>14</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9）三月廿九日：「鄉曲之士，耳無聞，目無見，有書數卷，一知半解，無由通古今中外之故……都邑之士，頗聞時事，然聞所聞，未見所見，言西人富強，則搖首不信；言西國文明，更拊心若疑。聞保種、保教之言，以為過慮；聞瓜分中華之說，以為訛言。遊歷之士，見所見矣，鐵路、輪船、觀其利便；機器、製造，識其靈通。然識其器，未能考其法；觀其物，未能究其理。惟讀書明理之士，披中西之編，得師友之助，目營四海，心通五洲，不必識其器而能考其法，不必觀其物而已究其理。」（皮錫瑞，2015a：870-871）

他的印記，只是科舉和官員任職等事務，尤其前者更是皮錫瑞閱讀報紙所首要關注的。皮氏閱報活動首示於日記，乃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初五：「予初一在滬得《申報》，已知鼎甲之名，殿元劉福姚，余洞激識其人，亦已丑中事，年甚少，出所書大卷見示，亦不甚佳」（皮錫瑞，2015a：53）。同年六月初三再記：「《申報》有明年春鄉、秋會之說，恐未塙也」（皮錫瑞，2015a：61）；同年七月十一記六月廿三日家信：「見《申報》極稱予在江右掌教之功……並載六月所出題。將覓《申報》觀之」（皮錫瑞，2015a：86-87）。翌年皮錫瑞的閱報活動的管道也唯有《申報》，只記錄了科舉與任官的相關消息。<sup>15</sup>此時，報刊尚未在皮錫瑞的閱讀世界佔據一席之地，自然也就談不上有所顯著的影響（至少於思想接受而言）。

皮錫瑞能夠走出「熟悉的日常」，得追溯至甲午戰爭這一關乎國家存亡的危機大事。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九（1894年9月18日）《申報》因中國電局不傳遞軍情，轉載自日本電報的消息，以報導平壤失利的戰況：「平壤地方已為日人所得，日人於十六日（西曆）攻平壤，分三路進兵。」後於八月廿一日詳細報導證實了平壤失事的消息。<sup>16</sup>《師伏堂日記》關於平壤戰敗的消息則見於光緒二十年（1894）九月初四：「報云平壤失守，李相亦得處分，甚有譏諷之詞。此人致寇負乘，固不足惜，將來大局可慮耳」（皮錫瑞，2015a：331）。報紙作為一種連接個體與世界的中介傳播系統，足以形成一個天下人共同參與的場域（王鴻泰，2009：48）。傳播媒體所載的語言不僅僅是再現或描述，事實上

---

<sup>15</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六月三十日、九月廿五日、十二月三十日。（皮錫瑞，2015a：182、212、239）

<sup>16</sup> 見《申報》第七千六百九十一號（1894年9月18日）〈東電照譯〉（「無名氏」，1984：112:）；第七千六百九十三號（1894年9月20日）〈平壤失事〉（「無名氏」，1984：125:）。

是一種對世界進行塑形與建構，雙向互動的行為方式。藉由閱讀而有所參與，整個生活方式都將有所改變（Carey, 2009：64）。就這點而言，皮氏於甲午戰爭中所表現出的「參與」，反映出日常狀態的變化，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閱讀習慣與交流行為，平時無閱報習慣的皮錫瑞近乎每日都主動閱讀《申報》或向友人了解最新戰況。<sup>17</sup>閱讀習慣的改變，除了讓皮錫瑞逐漸走出傳統世界的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展其對於周遭世界的認知。皮氏後來藉由新式傳播媒體接受著嶄新西學知識和世界格局，由傳統之「士」漸漸成為新知之「士」，閱報實為最大的推動力。這使皮錫瑞知識的接受資源不再僅僅限於過去的典範，而是能夠通過閱報來主動地接受著外來的西學。這點改變，除了是日常狀態的變化，亦是皮錫瑞思想境界的轉向。

甲午戰爭爆發以來，他對於中外關係的基準仍是以過去具體事實的歷史，作為當下現實的參照。皮錫瑞閱《綏寇紀略》，深感「明末之事與今略同，特今猶不至如此之甚，尚可為耳」<sup>18</sup>，對當今局勢未有多大存亡的危機感。他原先站在主戰一方，認為「天威赫怒」<sup>19</sup>，並對朝廷百官因議和議戰的問題而爭鬪於廷，表示此現象是「宋、明大弊，今復然矣」。<sup>20</sup>甚感事作詩云：「屏蔽何宜撤，

---

<sup>17</sup> 皮錫瑞閱報活動遽然頻繁乃從十月廿四始，記：「《申報》云俄皇死，法民主被刺，尚是好消息，彼二國當不動也」（皮錫瑞，2015a：348）。此後，除十月廿六、十一月初二至初四、十一月初九、十一月十一至十六、十一月二十、十一月廿三至廿六、十二月初一、十二月初六、十二月十一至十二、十二月十七至十九、十二月廿一廿二、十二月廿六至卅日外，皮錫瑞皆透過與友人交流、信件通報以及閱讀報紙來了解甲午海戰和京城時況的最新進展，並時有評論。（皮錫瑞，2015a：348-368）

<sup>18</sup> 見《師伏堂日記》，甲午年（1894）七月初十日。（皮錫瑞，2015a：304）

<sup>19</sup> 見《師伏堂日記》，甲午年（1894）七月廿七日。（皮錫瑞，2015a：312）

<sup>20</sup> 見《師伏堂日記》，甲午年（1894）十月十二日。（皮錫瑞，2015a：343）

唇亡自古爭……向來經國紀，初不諱用兵」<sup>21</sup>，一再痛斥李鴻章等人作戰不力，極力避戰。直到後來戰局已定，逐漸對中國的弱小有清醒的認知，從主戰立場逐漸轉向和議。他雖認為「倭寇實無大志，其取旅順、威海，意在踞險要以脅和，不犯京師與盛京，恐禍大無以為和議地耳」<sup>22</sup>，但中國已欲戰無力，不得不和。《馬關條約》簽訂前，皮錫瑞雖對外國列強頻頻侵擾邊疆各地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對於當時中國的局勢以及與世界的關係，是存有不準確的判斷（吳仰湘，2001：91）。戰敗的局勢令皮錫瑞徹底痛斥「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天下，壞於陰人賊臣之手」<sup>23</sup>，終從虛假的幻夢中醒過來，開始真正地「睜眼看世界」。與許多傳統士人一樣，甲午戰爭的戰敗所帶來的巨大刺激，讓本來只是鄉曲和都邑之士的鹿門猛然驚警醒，進而成「讀書明理之士」——主動接觸新學和維新變法的思潮，甚而加入變革行列——從一個有著強烈經世大志的傳統士人，變成思想開放的維新分子（吳仰湘，2001：95）。誠然，甲午戰敗的刺激令皮錫瑞原有的觀念徹底粉碎，得以再次審視過去所睥睨的西學和洋務，重塑認知。

皮氏接觸西學或洋務，首先感到的不是西方文明的富強，而是其侵略性。光緒十八年（1892）皮落第南歸，四月廿二日途徑造訪武備學堂，「見其地甚濶大，諸生各有課程，但分門太多，恐無實績，徒靡巨款而已。諸生方飯，暫停功課，不及見其肆習」（皮錫瑞，2015a：49）。吳大澂受委任湖南巡撫，鹿門評價之「此人為當今能臣，當能整頓地方，但恐其談洋務耳」<sup>24</sup>，言下之意即整頓湖南局勢萬不可推行洋務。如此「都邑之士」之態度，不僅對西學與洋務

---

<sup>21</sup> 見《師伏堂詩草·談時事有感之二》。（皮錫瑞，2015b：354）

<sup>22</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二月廿一日。（皮錫瑞，2015a：385）

<sup>23</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三月廿六日。（皮錫瑞，2015a：397）

<sup>24</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六月廿四日。（皮錫瑞，2015a：80）

了解不深，也充滿不信任與排斥的鄙薄之意。皮錫瑞第一次接觸袁翔甫所著的出洋遊記，「見洋人風俗甚異，其國能上下一心，道路不爭鬥，而三綱不立，陰陽倒置，皆不明倫之故」以傳統舊學三綱倫理的眼光，認為西方毫無倫理，故「著人往設教、起書院」，如此一來「可動洋人向化之心」和「維繫華人在洋之意」，並「將使聖教達乎四裔」。<sup>25</sup>其後，他讀《四裔年表》，深感外國多異聞，卻「日尋干戈，視中國亂尤甚，或謂其有三代氣象，殊不然也」。<sup>26</sup>閱讀所得認知乃西方諸夷的文化不如中國，故也未能給予洋務相應的肯定。既如批閱學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文章：「說者多言洋務，或言是，或言非，此以言洋務為非者為合題」<sup>27</sup>，足見其對西學乃至洋務一事都是睥睨之情。西學毫無疑問仍未在這位四十多歲的傳統士人佔據一席之地，不予重視。

皮錫瑞首談西學與洋務，應起於與學生鄒凌翰（殿書）談洋務一事，對於鄒所云「（洋務）只要有人講求，百年後必得其利，洋人所變新法，亦非一時即成者」，自認似有道理。<sup>28</sup>自此，他便常常與留心時事與通西事的經訓諸生悉談洋務，逐漸以開通虛衷的眼光去接受西學。光緒十九年（1893）六月初十，皮觀《環遊地球錄》時，已感「粗通西國事」，評論「西洋立法仁至義盡，但恐受西人之愚耳。而其機器之巧妙，輪車之迅速，能鑿山腹、入地中，當非虛語」，始關注西方文明的富強技術，但仍舊對其政教制度抱有保留疑問之態度。<sup>29</sup>日後，他回憶默記書中內容而作《題環遊地球新錄》，疑問的態度漸漸轉變為

---

<sup>25</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五月十二日。（皮錫瑞，2015a：55）

<sup>26</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正月初九日。（皮錫瑞，2015a：130）

<sup>27</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四月廿四日。（皮錫瑞，2015a：158）

<sup>28</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四月初五日。（皮錫瑞，2015a：152）

<sup>29</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六月初十日。（皮錫瑞，2015a：174）

對西方種種之物的好奇。<sup>30</sup>下引數句：「倫敦為英都，恃險城不築。繁富冠城中，居民或疊複」、「鑿地通火車，胡不畏傾覆？登樓用機械，得毋苦踉蹌？」<sup>31</sup>，反映了其對西學的粗淺認識與反思。皮錫瑞對洋務的肯定，亦能從其對經訓諸生課卷的評價窺見一二。閱王子庚針對火輪車所作《奇肱飛車賦》，評「筆力甚健，亦通洋學」，而「非有私見，亦憑文耳」列為師課卷第一。<sup>32</sup>再評王《南北洋增設海軍賦》：「筆力健舉，洋務通達，諸國兵數皆能指實，由於平日用心」，對於現今諸生洋務只重軍事，亦感「近日取士亦尚時務，然人人抵掌談兵，非治世之兆也」。<sup>33</sup>比照先前只談軍事邊防，現今的他愈能清醒了解到中國欲富強不能只單純講求軍事，已能以較為開通的態度去接受洋務運動所追求的技藝工業，已然為「遊歷之士」。富強之道路不僅僅只存在技藝工業的強大。在救亡圖存的憂患之下，大量吸收西方新知的知識索求，將實學求變的意識從洋務實業本身提升至學術的格位，已是大部分有志之士的共有意識（王爾敏，2006：33）。這種意識跳脫了先前的技術追求，進而著手於各方面的改革，當中也包括了精神上的啟蒙與醒覺。當傳統閱讀模式逐漸被新的洋務書以及報刊所取代，觸發思想範式的轉向，皮氏亦循著傳統世界所遺留給他的思想資源，學習且反思西方政教歷史的經驗以求變革，漸漸走向變法維新的道路。

---

<sup>30</sup> 見《師伏堂日記》，甲午年（1984）八月廿九日。（皮錫瑞，2015a：328）

<sup>31</sup> 見《師伏堂詩草·題環遊地球新錄》。（皮錫瑞，2015b：382）

<sup>32</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七月十六日。（皮錫瑞，2015a：188）陳平原認為，海外遊記、科普讀物以及《點石齋畫報》對「飛車」的介紹基本只考慮科學層面的意義，士人所能接觸的「飛車」（陳氏指出為飛艇或氣球，此處則是火輪車，亦可能為理解不同之故）有著作為「飛向天空，飛向未來，飛向新世界」的特殊現代想象，是「科學」與「殖民」力量的象徵。（陳平原，2008：128-170）

<sup>33</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八月初三日。（皮錫瑞，2015a：195）

## 第二章 轉型時代的未竟之業

處於時代變化轉換的時候，傳統士人漸漸摒棄了舊有觀念，而主動步入了現實的這片天地之間。為消解這種與熟悉過去相衝突的陌生境況，藉由閱讀致知，交流言思，積識通博，開展自身的思想歷程，已是驅策前行的動力。丘為君形容此現象乃「自覺到自我置身於一個受到前所未見的西方衝擊的新社會形勢之中」，面對新思潮新視野的新世代，「無法或不願意再回到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政治與倫理體系」（丘為君，2018：159）。除了是傳統讀書人無法回到了那熟悉的天地之間，毋寧說西學所帶來的新價值觀消磨了傳統價值的主導地位，而改變讀書人閱讀和思想的傾向，形塑了中國近代的閱讀世界（Fischer，2003：110），既如皮氏亦然如是。

現代意義的報刊媒介進入了其閱讀世界，透過頻繁的報刊閱讀接受西學知識，認清中國急需富強的當下需求，付諸渴望實踐的嘗試。既有固定的傳統範式已然受到挑戰，接受傳統教育浸染多年的皮錫瑞，是如何完成思想上的轉向與定型，最終投入到南學會講學「啓蒙」的改革共同事業？其變法思想中極為明顯的「復興」資源是如何被視作堅守的原則？最終又為何憾然成了一個未能完成的志業呢？

## 第一節 西學接受的變法思想

甲午以前的皮錫瑞對西學有所認識，直到經歷戰敗的刺激，恐怕亡國滅種的警覺，促使他開始主動接觸變法維新的知識，方慢慢完成思想上的轉向，成為其所言「讀書明理之士」。既可謂之「讀書明理」，甲午前後皮錫瑞的閱讀活動首要的改變，便是廣泛接觸變法和西學典籍文章以及維新報刊。

據《師伏堂日記》所載，皮錫瑞首言變法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初九，他得友人送岡千仞《尊攘紀事補遺》及鄭觀應《盛世危言》，對鄭的變法主張不以為然：「多《申報》中議論，無過人者」，認為當今局勢「見在行事，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臧吏、債帥以法，實事求是，乃可變法。變法應先改宋明陋習，復漢唐郡兵藩鎮之制，則兵強可以禦侮，不必從夷俗反肇亂也」（皮錫瑞，2015a：434）；夜閱《萬國公法》：「情理兼盡，始知諸國強弱大小能互相維者，特有此法。中國不在內，非必彼擯不與，亦由中國自大，不曾留意，能用其法，或可稍顧目前也」<sup>34</sup>；見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前說寧遷都不可和，詞甚激昂，意亦曲暢。後半仍是《申報》議論，用夷變夏，未能探其本原」。<sup>35</sup>閱讀習慣的改變，思想也逐漸開放接受「以西學改造中學」變法維新意識。鹿門廣泛閱讀變法相關書籍，亦對變法有自己一套見解，並非是全盤接納他人所說。變法書籍除《盛世危言》外，皮錫瑞亦通讀彭宮保《洋務十三則》《公車上書記》《洋務抉要》以及陳虬《蟄盧叢書》。對於陳虬言變法需

<sup>34</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六月廿一日。（皮錫瑞，2015a：438）

<sup>35</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七月初二日。（皮錫瑞，2015a：441）

要完全依照西法，皮錫瑞不以爲然。他認爲「不知中國所以牽制過多，萎靡不振、欺蒙廢弛之弊，由於文法太密、胥吏特權，欲奪其權，非舉所謂律例案卷者一切焚之，不足以奪其所恃。非先變此，何以變法？」然書中提及議院、君權、新聞、婚姻自由、鐵路利而難行中華等事宜是當今言洋務變法者所忌諱不談，亦有可取之處。<sup>36</sup>變法之論，皮錫瑞尤服膺康有爲，評價其上書「切實可行，真起病之良方」，但認爲康有爲變法「掃地更新」的主張必多阻礙，且「弊多利少，皆爲此也」。<sup>37</sup>於諸多變法之論，如陳熾《庸書》《續富國策》多可行，「然統籌全局，權其先後緩急之序，一一如指諸掌，終以南海之四上書爲最」。<sup>38</sup>即使不完全認同康有爲變法主張，著眼全局亦惟推康，可見皮氏善於多加比較各家之說以切合己見，而非單純只盲目追隨一說，實在有自身變法之價值判斷的基準。這點尤可見於他通讀《泰西新史》的心得。他循西方各國歷史爲鑒，以俄國沙皇彼得大帝變法「國不設議院，西人笑其古拙，不從新法，則其制度必有與中國合、與西國異者」<sup>39</sup>，故中國變法必然不得凡事以英人爲是，需考究諸國同異方能夠真正實施維新改革。

甲午以後皮錫瑞的讀書世界，新增許多關乎變法和西學等書籍，尤其對於西方各國史地最爲關心。前述《四裔年表》《環遊地球新錄》以外，皮錫瑞於甲午戰爭期間還閱讀了夏燮《中西紀事》、鄒代鈞《西征紀程》和賴山陽《日本外史》。若說《環遊地球新錄》遊記讓他能夠略通西國諸事，甚而「會畢歷

---

<sup>36</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九月廿一日。（皮錫瑞，2015a：471）

<sup>37</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7）七月廿七日。（皮錫瑞，2015a：689）

<sup>38</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7）八月廿四日。（皮錫瑞，2015a：704）

<sup>39</sup> 見《師伏堂日記》，丙申年（1896）三月廿一日。（皮錫瑞，2015a：522）

諸國」「地球環一周」<sup>40</sup>，閱讀西方歷史戰紀則能從中了解西方政教，並比之於中國現實要務。閱讀《西征紀程》：「又言外國公法，凡為人屬國，不得與他人立約通商互市，以其為人臣屬，不得自專也」，從而了解先前越南、朝鮮戰事發生乃中國不問屬國擅自與他國通商，遂有「近海各島宜設兵，據險築礮臺，以固門戶，毋使夷船闖入，則彼物寄泊之所，不能內侵」的想法<sup>41</sup>；《日本外史》記：「源氏衰而其家臣專政，正如東周，政在諸侯，又在大夫，而陪臣亦執國命……至於尾大不掉，強者稱雄，近唐之藩鎮，亦其勢然也。」<sup>42</sup>上述閱讀心得仍以熟悉中學眼光來理解陌生的西學，不免帶有個人接受與現實情況理解上的偏差，認為中國之弊不在從西方之制便可盡祛，而是需整頓內部已不合時宜的舊制。與其說是皮氏堅定認為西方文明是洪水猛獸，更像是接觸面的局限，而對西方抱有戒心與懷疑。皮錫瑞較之擁有出國遊歷經驗或沿海一帶的士人群體，其所在的湖南內陸面對西方的衝擊實際上是要淡得多，毋論皮錫瑞真正開始接受西學和接觸維新群體自甲午以後不過數年左右而已。即使他認為西方確實有中國可取效仿的優勢，但接受上多是把完全陌生不了解的新事物漸漸變得習以為常，所閱讀之西學書籍，大多都涉及史學通論，沒有技術、制度等的專門知識。皮鹿門閱讀西學書籍的用心，乃是一種「以西補中」的意圖，這也與他傳統學術「通古今之變以致用」的底蘊有著無法切割的關係。我們與其說資源有限，不如說皮氏思想境界所能觸及的視野僅就能與傳統學術相互照應的場域，其他專門「西學」知識自然也就非皮氏所能用心的了。

---

<sup>40</sup> 見《師伏堂詩草·題環遊地球新錄》。（皮錫瑞，2015b：383）

<sup>41</sup> 見《師伏堂日記》，甲午年（1894）十二月初五。（皮錫瑞，2015a：361）

<sup>42</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閏五月初二日。（皮錫瑞，2015a：419）

以此而言，皮氏之思想固然不能說完全趨新，卻於主動接觸與接受西學方面，邁出一大步，閱讀的視野也擴充到新式維新報刊。他自友人夏鑿臣處攜歸《時務報》，閱之：「其議論較《申報》殊勝……論變法，謂中國與前不同，不值泰西各國，猶可不變，今變亦變，不變亦變，將有人代變矣，此非《申報》所及。」<sup>43</sup>處處「與予見合」的時務報成了皮錫瑞閱報的首要選擇，且「倦時閱《時務報》數本，每日皆然」。<sup>44</sup>《時務報》以新聞的形式供應公共化的「世界知識」，具備實用意義，且也是讀者掌握世局變化的接受西學的主要構成要素之一和入門之鑰匙（潘光哲，2014：208）。閱讀所接受的西學資訊讓讀書人得以透過具體的事務，建立一種關懷當下的現實感，開始議論時政，參與變革，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共輿論的基本空間。<sup>45</sup>閱讀具有雙重功能，並不僅只是一種智力的抽象運作，同時也將促使自身投入於社會空間，建立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以鞏固社會性的連鎖形式（Chartier，1994：8）。這社會性包括了家庭的親密關係、世俗娛樂以及文學和學術的社交圈子，促成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相互映照。公共領域出現的其一條件便是伴隨著閱讀文本（如書籍、雜誌、報紙）的日常生活化，產生以閱讀為中介、以交流為核心的讀者群體，形成具有開放性與批判性，在政治權力之外的公共討論空間（許紀霖，2011：85）。透過閱讀發生的西學接受，皮錫瑞就自己知識框架的理解，比較參照傳統資源與新知資

---

<sup>43</sup> 見《師伏堂日記》，丙申年（1896）八月初六日。（皮錫瑞，2015a：569）

<sup>44</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7）九月初一日。（皮錫瑞，2015a：706）

<sup>45</sup> 以傳播心理學「使用和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的理論框架而論，活躍的消費群眾通過選擇性接觸媒體和特定內容來滿足一定的心理社會需求。閱讀被證明主要有助於滿足學習和知識擴展的需求，同時還滿足了與直接社交環境的社交需求：它是展示文化資本以及與精英群體建立聯繫的方式（Adoni & Nossek，2011：49-63）。換言之，閱讀所提供的學習與知識資源，是交流場域的形成條件之一。

源的互補之處，開展自身獨特的思想活動。此番日常實踐的驅動之因乃基於救亡圖存「人已岌岌，中國猶不悟」的憂患意識<sup>46</sup>，標誌著皮錫瑞思想趨向變法維新。如此，他才得以走出學術象牙塔的私人領域，參與到湖南新政與維新群體的公共社會之中，促成人生歷程中短暫卻最為輝煌的另一種活動領域。

## 第二節 「復興」與「啓蒙」的思想資源

「轉型時代」下的個體一方面逐步落實強烈的變法改革，另一方面亦未能與舊學傳統學術的滋養徹底割裂，從而形成新舊交疊的複合思想，亦可表示皮氏西學接受的「過渡」樣態。皮錫瑞歷經甲午戰敗，思想轉化以後，有著三大主要認知：一、中國之大弊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二，從「天下」至「萬國」世界觀的轉變；三、皮錫瑞變法維新思想不變的「本原」：反對完全的「掃地更張」，盡去中華，堅持「中體西用」。上述三個概念乃皮錫瑞成「讀書明理之士」以後一以貫之的主張，其最終導向乃是「復興」與「啓蒙」。

中國之疲弊為何？皮錫瑞認為中國之大患：「在上下之情不通，非止君門九重，蟣蝨之臣不能上窺閭，即地方官與地方百姓，亦隔絕不相通」<sup>47</sup>，大力斥責中國內部法治不齊，貪污腐敗，上下無法同心的弊病。皮因長年北上南下，

---

<sup>46</sup> 見《師伏堂日記》，丙申年（1896）四月十七日。（皮錫瑞，2015a：532）

<sup>47</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廿九日。（皮錫瑞，2015a：872）

四方羈旅，多次遇關卡官吏誤事，而有「官不勤政」之想。<sup>48</sup>中國現有此弊，乃承宋以下之遺毒，他在其日記中，就經常以宋明弊政來比照晚清時事政局，坦言「議論多而成功少，自宋始；法必不可變，亦自宋始，中國不復振，亦自宋始，不鑒其覆轍，奈之何哉！」<sup>49</sup>維新變法之行必先從內部著手，改宋明制度之陋習，符合皮錫瑞對通古今之變的學術思路。閱千古史事以切今時之時政，歷經漫長年月累積隱伏的歷史記憶，往往被現實中的重大事件所呼喚激發，迫使他有所現實興亡之感時，便改變閱讀態度，求變而取法於古。<sup>50</sup>尤其同為被外敵入侵而亡國南遷的宋朝事，成為皮錫瑞「抗論時事，盱衡今古」的參照對象。維新講學欲諸生「由草昧（守舊）而變文明（開民智）」<sup>51</sup>，勸勉眾人不可拘守古法而不變。復古主義的人是要跨越當前的傳統，以回到那個相比起現時更高和更純粹的古代（王汎森，2003：121）。在皮錫瑞看來，唯有通古今之變才能究變法之道而自強。直到晚年，他仍一直堅持這一思路，強調：

且今方言變法，尤宜講求古今通變。漢唐以上，何以富強；宋明以下，何以貧弱？誠於歷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瞭然心目，思所以善

---

<sup>48</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巳年（1893）二月廿二日、乙未年（1895）九月十三日、丙申年（1896）五月初三日。（皮錫瑞，2015a：139、468、515）

<sup>49</sup> 見《師伏堂日記》，己亥年（1899）九月廿三日。（皮錫瑞，2015a：1138）

<sup>50</sup> 縱觀皮錫瑞晚年所處清朝「亡國之象」最為迫切的兩大戰役：甲午海戰、庚子國變以及八國聯軍之戰，在皮錫瑞的日記裡均有閱讀《宋史》的記載。庚子國變發生以後更閱《文獻通考》《資治通鑑》考漢唐盛世制度與興亡事跡考漢唐盛世制度與興亡事跡，足見鹿門通達古今之變的原則。見乙未年（1895）五月廿七日、六月初一、庚子年（1900）六月至八月事。（皮錫瑞，2015a：417、430、1236）

<sup>51</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閏三月十九日。（皮錫瑞，2015a：861）

變而取法於古，有不必盡學於四夷而自可以強中國者，豈惟斷斷然取陳人朽骨，而與之較短長哉？（皮名振編，1981：80）

比起同時代的維新人士普遍認為拯救中國的良方遠在西方，皮錫瑞更相信中國固有的古代文化傳統能夠給予現今中國內在醒覺的資源。既如傳統士大夫以三代氣象為重整社會秩序的最終願景，皮錫瑞於現今萬千破碎瓦礫堆中，能取法於開通富強，革求中國貧弱之勢，便是漢唐以上盛世太平的宏規。

於當今世界，中國何以自處？面對可能遭列強瓜分的憂患，皮錫瑞開始將目光移向地球諸國的相互關係。自閱《萬國公法》，疲弱的中國如何與其他國家競爭以自存一直是皮錫瑞所關心的問題：「今中國不能自立，若入外國公法，或猶可苟安否」。<sup>52</sup>皮錫瑞於《萬國公法》的閱讀體驗，不啻徒興自大的中國不曾留意此公例，而是希望能用公法以自強，改變目前不平等的國際關係（佐藤慎一，2008：40）。從往日「天朝上國」的意識轉向「萬國」，皮錫瑞清楚認知中國國力已不如西方諸國，唯有先合群力富強，才能與各國平起平坐，否則也只不過淪為列強瓜分的殖民地。<sup>53</sup>也就是說，公法的權利維護唯有建立在勢力均衡的國際關係上，才能發揮其規範國際秩序的功能（林學忠，2009：225）。面對中國無力抵禦外國侵略的時局，皮致信友人嘆之曰：「方今議論，皆云變

---

<sup>52</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八月廿一日。（皮錫瑞，2015a：461）

<sup>53</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7）十一月廿四日：「有恐輪船，鐵路引洋人來者，此前一二十年情形。今中國已不國，彼欲來則來，何須人引？」（皮錫瑞，2015a：737）；丁酉年（1898）十一月十六：「予謂但能自強，聯俄可也，聯英亦可也，聯日亦可也；否則，聯俄將為波蘭，聯英將為五印度，聯日將為朝鮮，恃人總非計也。」（皮錫瑞，2015a：749）

法自強，然今日之局勢，如病已入膏肓，論者始欲學醫以治之，即遇長桑君飲上池水，亦恐緩不濟急。」讀《萬國公報》知各國割地侵利權時也感歎「比中國於病人，更可憤也」。<sup>54</sup>職是之故，皮氏認為今日中國本身乃疲弱而無以抗衡諸國，處於國家競爭交涉的時代，是位於不利局勢的。<sup>55</sup>自開始閱報密切關注時態局勢和吸收新知，皮錫瑞便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保持戒心，同時亦深切了解當今國勢已無法阻擋西方的鐵炮，唯有盡量不生事端而力求自保，待到富強之時方能與之周旋。皮錫瑞於自強的著重點更傾向於地方自治，頗具鄉土意識：「現在辦法（阻列強瓜分），惟有先自治，禁勿入教，勿買地基與西人而已」<sup>56</sup>，對於中國整體尚未有完全的瞻望。所謂地方富強之法，就是振興商務，尤其需破守舊朽人與未醒諸生的拘墟之見，接受洋務實業，力求能夠同心發展，如此必然需城鄉紳民的共同努力：「若城中巨紳先去，以為民望，鄉下欲為亂者必劫掠蜂起矣。現在湖南急務，當練兵以備亂，清保甲以消伏莽，開商務以活貧

---

<sup>54</sup>見《師伏堂日記》，丙申年（1896）正月十七日、二月初四日。（皮錫瑞，2015a：501、506）疾病本身具有的隱喻：死亡、人類的軟弱和脆弱，常被用來描述身體整體性。當疾病本身的邪惡同義意涵的隱喻，用於政治狀況，「就是在把罪惡歸咎於它，為它開出懲治的藥方」（蘇珊·桑格塔，2003：73）。關於「病體」「病人」（Sick Man）的比喻符碼，楊瑞松推斷本就是用來指設自中日甲午戰爭後所產生的東亞國際新局勢，形容當中中國國力之弱（楊瑞松，2005：12）。顏健富探論晚清小說「病體中國」的概念時，認為這種身體=國體的新視角，正是從「天下觀」的「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轉向近代意義的「國」與「國」的概念（顏健富，2014：211）。綜合上述觀念，皮氏對於「比中國於病人」如此憤慨的因由，應是他對於中國當今所處疲弱局勢的現實認知，故常常思考著疲弱之因與解救之方。

<sup>55</sup> Rebecca E. Karl 指出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成為歷史意識和爭論的前沿的現象，只有在劇烈的斷裂或歷史錯位之際才變得明顯，而晚清中國的衝突情形——內部的崩潰刺激以及國家關係的危機理論化的努力——恰恰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這樣一個時刻（Karl，2002：53）。正因皮氏將中國本身置於世界大舞臺的平等地位，才能認知方今時勢已然不同往日「中國」，於認知的情境繪圖中，如何富強以自保，喚醒草昧朽人，就成了當下首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sup>56</sup> 見《師伏堂日記》，乙未年（1895）十月二十日。（皮錫瑞，2015a：479）

民，未知官紳見及此否」。<sup>57</sup>他協助兒子皮嘉祐作被以葉德輝為首的守舊派詬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蘇輿，1971：415）的《醒世歌》，以期能夠「喚醒夢夢，使桑梓之禍少紓耳」。<sup>58</sup>胸懷「啓蒙愚昧」大志的皮錫瑞對於守舊維新兩派的作法與活動實際上都是為自己利益有清醒的認知。<sup>59</sup>於此，才更需要破除門戶之見，同心一致，通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以變法。自「定於一尊」的天朝意識粉碎，傳統憂患意識欲開通吸收新知的兩種力量糅合貫通，遂形成皮錫瑞「兼」與「群」合一的新思想。若沒有甲午戰爭後的新認知，這種啓蒙觀自不可能成型。

變法「本原」為何？皮錫瑞維新思想的變法主張「漸變」而反對盡變，堅持中學（尤其經學與史學）的主體地位，主張「法」（制度）可變而「道」（三綱五常的倫理）不可變——前者歷久必變，後者千古不易，乃「亘古今，通中外」的道理。<sup>60</sup>梁啓超痛言中國變法只專注外在引入西方技藝，而非專注於國內改革學校、科舉、官制一事，皮錫瑞知悉便謂「探源之論」。<sup>61</sup>他倡導引進西方技術以自強，也透過閱讀《俄游彙編》、《中倭和戰》、《中國宜改革舊法論》，認為西方之法非不能遞行中國，將來中國「必有盡變西法之時」。<sup>62</sup>如何實行中西匯通的同時又不失中國固有傳統文化的三綱五常與學術思想，是皮

---

<sup>57</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8）十二月十一日。（皮錫瑞，2015a：746）

<sup>58</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六日。（皮錫瑞，2015a：831）

<sup>59</sup> 見《師伏堂日記》，丙申年（1897）十二月廿三日、戊戌年（1898）二月初九日。（皮錫瑞，2015a：609、786）。

<sup>60</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廿四日。（皮錫瑞，2015a：838）

<sup>61</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7）十月十六日。（皮錫瑞，2015a：722）

<sup>62</sup> 見《師伏堂日記》，丙申年（1896）三月三十日。（皮錫瑞，2015a：526）

錫瑞所日夜思索的問題。<sup>63</sup> 新知西方與傳統中國兩種文化都各有著夠改變當下弱勢的可用資源。差別在於改變的程度並不能只傾向於一端，而是要融匯貫通，取雙方之所長補雙方之所短。一個人的思維往往受限於時代框架，毋論皮錫瑞接觸西學乃是「半路出家」，其所仰賴的新知資源也是透過維新報刊、翻譯西籍以及維新人士的交流，又受經學義理浸染深刻且久遠，始終認為中學於今求變的時代仍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

中國自有教旨、學派，二千年來信從已久，豈能盡棄其學，全仿西人？西學近乎格物致知，孔、孟、程、朱雖未見過此等顯門之學，而其理已具於格致。中西之學，源流各別，而能多讀中西之書，深究其理，以觀其會通，則亦未嘗不可相遇。兼講西學，以補中學，可也；盡棄中學，專用西學，不可也。<sup>64</sup>

皮錫瑞固然受「西學中源」和「中西會通」的觀念極深。當立足於傳統儒家的價值體系，自不可輕易盡棄。清楚意識到「今中國已不中國」，欲學習師法西方汲取變法資源，便不能再被動地維護著原先循環且停滯「法不可變」的思想觀念。基於這點，他積極開導湖南鄉紳支持湖南新政，引進西方科技工藝，強調堅持中學為先的原則之餘，也大力抨擊守舊朽人只遵循古法（指宋明而言）

---

<sup>63</sup> 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897）十月廿七日：「夢與人談西法，謂泰西諸事盡善，惟無三綱；伊教同於佛法平等，故不知有君臣父子，尊卑上下之義；近聞能讀中國書，將來或亦覺悟，能改從周、孔之教乎？此平日常言者，夢中猶記不誤。」（皮錫瑞，2015a：726）

<sup>64</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四日。（皮錫瑞，2015a：823）

而不能開通接受新知革除當今弊政：「俗人皆以變法爲難，恐無人能做，無人能看，不如即用《四書》論，略變格式，用魏叔子制科策，法最易而人皆不知」，對葉德輝的指謫感不以爲然，「我用我法，不能隨人作計」<sup>65</sup>，足見其態度之堅決。「深究其理，以觀其會通」之想，究其思考本源，乃是對經學倫理脩身的傳統精神有著極大的信心。列文森於《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將這類人的思想稱爲「折衷主義」：大力倡導將西方的物質文明納入中國文明，卻始終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將西方作爲一個價值中心來看待，但它仍然保留了中國最基本的優越地位」；具有「折衷」性質的傳統主義者意識到只有立場一致才有可能保護中國本土文化免遭西方侵害，故關心的不是一般知識的普及，而是如何使得西學表面上合法化，以符合中國之思想，便於接受（列文森，2000：46）。這點與皮錫瑞的變法思想是不謀而合的——他於南學會演講以傳統經史爲依據，大談素王改制之說，探究變法的合理性，主張應破除學派門戶之見（調和程朱陸王和貫穿今文漢宋），其主要心力是保種保教，保存中國文明。他對張之洞發電報斥責南學會講求孔子改制，直言「習俗限人，賢者不免，爭學派尤文人陋習」，感歎：「予以爲在下之錮蔽終可開通，在上如此，終無開通之日，殆中國無轉幾乎？」<sup>66</sup>除學派思想分歧以外，面對西學衝擊導致中學逐漸沒落的境況，鹿門有感「未得西學，先亡中學」之患，強調：「學者必先講求義理，立身乃有本末。聰明才俊之士，尤須以此範其心志，乃能立定腳跟，否則恐其入跡弛不羈，虛僞無用。若欲保全聖教，須先講明孔教義理，使中國人、外國人皆知孔教之大，皆能尊信，而後可保不廢」<sup>67</sup>，價值的歸向甬說以西

---

<sup>65</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八日。（皮錫瑞，2015a：832）

<sup>66</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閏三月廿五日。（皮錫瑞，2015a：868）

<sup>67</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四日。（皮錫瑞，2015a：823）

方政教為依歸，而是因應時代洪流的走向，欲以外來新事物充實補充經已處於落勢的舊有傳統。恰似「天地之氣運當變，能迎其機而自變者，其國必昌；不能迎其機而自變者，其國必亡」<sup>68</sup>，不可不謂皮氏心力所在始終圍繞變法自強罷了，而未有真正意義上欲根本上「破舊立新」，改革思想種子的時代意識。

復興古學的外在追求是以漢唐盛世危目標的話，在內的主要意涵，便是學經以為體且致用。皮氏批示學生課卷便道明：「若謂談經學不必及時事，則五經真同芻狗，而經義可廢矣。學者尊聖教，崇經義，宜有貫徹古今中外之通識，不當專持拘忌狹隘之迂談。」<sup>69</sup>皮氏的西學接受相對於傳統讀書人群體，或許更多體現於「變法」而言，但這一傾向本就是其治經的精神：「凡學當求心得，古人之自成一家者，其學皆有所長，非可輕詆」。<sup>70</sup>茲以所述「學術無法致用便等同無用」的實用觀念，外來學術的價值在於能夠匯通本土固有的傳統資源。這種強烈的動力式接受心態，根本上的心力所在乃是「聖教」「聖人之道」的發揚。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洋務書與維新報刊的閱讀確實帶給皮錫瑞不一樣的人生路徑，走出經訓書院的象牙塔氛圍，立足現實群體活動加入南學會。以閱讀為媒介所形成思想轉向，於轉型時代的大變動之際，西學接受由衷的出發點和整體思想主心，是兼具傳統之「士」與西學觀之複核。由儒家傳統「士」變為改革求新的「新士」——轉向不徹底而深陷傳統新知過渡之間的情況使得皮氏的社會定位變得矛盾微妙，遂常常徘徊於新舊之間。待政治鐵錘摧毀了前行的道路，便重新回歸熟悉的傳統世界的憑藉之中。

---

<sup>68</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閏三月十九日。（皮錫瑞，2015a：864）

<sup>69</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八月初七日。（皮錫瑞，2015a：965）

<sup>70</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辰年（1892）一月廿四日。（皮錫瑞，2015a：22）

### 第三節 新舊之間的矛盾中間派

近代中西接觸為中國朝野各階層的人士帶來前所未有的嶄新經驗與知識。王爾敏先生探究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時，指出每人對於新外來事物理解與接收深度的不同，在同一個時代的對外態度也顯現著非理性與理性的兩個方面——前者所表現的是「先入之見的排斥」與「勉強被動的適應」，後者「不乏創造性之反應」與「主張折衷與調和，使固有知識與新觀念融合一致」（王爾敏，2003：8）。舊有的文化根柢與新來的觀念所形成的對立與調和，是傳統讀書人所要面臨「重整定位」的過程。因救亡意識而開始「破舊」與「立新」的運動，讓朝野士人們都需選擇站在「新」還是「舊」的立場上。<sup>71</sup>這當中毋論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國知識階層的世界觀發上巨大變化，新舊和進步保守漸成價值判斷的依據，造成了二元對立的善惡之分（羅志田，2014：37）。這種基於傳統的價值無法應對世變與事變，在近代價值轉換期中暴露出「價值原則和價值承當之間的持續、根本的背離」危機（高瑞泉，2015：24）。按此趨勢所發展下去的便是促成戊戌變法湖南地區「守舊」和「維新」的爭端。

近代新舊之爭大體上反映了進步與落伍的時代特徵。然而以二元對立的前提——認為舊黨必然全面反對維新政策的傳統階層，新黨肯定是全面否定批判

---

<sup>71</sup> 實際上新舊立場的選擇並不直接影響士人之間的交流情誼，舊黨作為士紳亦然也是推動新政的一分子，與維新群體也多有往來。舊黨代表人物的王逸樞召開酒席，座上便有江標、黃遵憲、梁啟超、李維格、熊希齡維新志士在座；反之，時務學堂梁啟超與李維格的酒席上，在座者便有王先謙與葉德輝兩舊學分子，故皮錫瑞感「（在座）守舊、維新，議論不一，予是以知湘中風氣尚未開也」，表示了其趨向維新且欲舊學轉向，同心合群的意願。見《師伏堂日記》，丁酉年（1987）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月廿六日。（皮錫瑞，2015a：731、738）

舊有傳統的新知識群體——截然劃分新舊兩派的判斷，往往存在著先入為主的傾向。兩方的出發點往往都基於救亡圖存，富強進步的憂患意識，卻因大體傾向或信仰價值上的不可調和，才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李孝悌指出，每一個參與全國性「開民智」運動的知識人或志士不一定具有共同的意識，所發出的聲音是衝突和互相矛盾的（李孝悌，1994：65-66）。所謂的新舊對立就如同並行互存行駛的列車，從同一個車站出發，目標終點乃是一致的，歧異只在於選擇了哪一條軌道前進至終點。不巧的是，前行的軌道因錯位而形成了一種相互碰撞的競爭狀態。新舊分門別類的現象，當中存在著互補而相互依存——既如個體繁複的思想那樣，對峙的分野往往是立場的選擇，而非整體的思想面貌。作為既不完全「新」（如譚嗣同、梁啟超等維新者）也不完全偏向於「舊」（王先謙、葉德輝等紳士），皮鹿門在思想系譜上更像是溫和趨新的中間派，是處於過渡時期新舊爭端，思想介於兩派之間的人。<sup>72</sup>

皮錫瑞雖於社會角色的分類中，被認為是擁有功名的士紳階層。實際上，比起在地方掌握更大地方權力的葉德輝王先謙諸人，他在湖南地方實在不見有多大影響力（至少於士紳作為社會重心的標準而言）。他之所以趨向維新一派，是形勢所迫，也不無表現著他間接地透過加入維新陣營來獲得重建社會重心的需要。當他掙扎「留南」或「北上」，最終作出的選擇除了表明加入維新陣營的政治態度，亦是徹底告別了科舉一途（王汎森，2017：336）。為了同時實現「變法維新」的主觀願望和「養家糊口」的客觀需要，接任南學會學長，正好

---

<sup>72</sup> 丁平一《湖湘文化傳統與湖南維新運動》和許順富《湖南紳士與晚清政治變遷》對湖南維新運動的觀察與分析，均將皮錫瑞視為思想介於「守舊」和「維新」之間，與激進維新和守舊洋務相比，趨向溫和，不主張進行徹底地改造舊制度（丁平一，1998：117-118；許順富，2004：218-224）。

提供他完成「啓蒙」眾人的超然意識一個極佳的管道。即使受戊戌政變波及而深陷文網，回憶主南學會學長一事：「憶去年今日，登堂開講，議論衍衍，響如振玉，冠裳踏濟，極一時之盛事」，言語間無不透露著自豪。正因那是人生最為輝煌的篇章，也是他最備受自我與他者肯定的時期，如今困於文網，只能埋首於曾發願「束之高閣」的故紙堆窘況才更顯得「滄桑變幻，不異黃梁一夢」，唯有借東坡詩「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以自傷。<sup>73</sup>

皮鹿門南學會的十二次講學都是從傳統儒學加以今文學家「素王改制」之說為出發點，賦予這些學說切合時勢的新義理。通觀皮錫瑞的日記，他實際上對於西學的領略並不深，對外國也有不少先入為主的偏見認知，比起維新一派主幹的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等人可說是所知甚少。<sup>74</sup>皮氏雖能於湖南新政中接受南學會各同仁的創見，就連他們意圖把南學會作為開議院的基礎，而非以講學為主旨，有所顧慮，卻也不無讚成。<sup>75</sup>整個湖南新政的運動中，皮錫瑞所主

---

<sup>73</sup> 見《師伏堂日記》，己亥年（1899）二月初一日。（皮錫瑞，2015a：1042）

<sup>74</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七日載：「現在中國以為白種即《山海經》白民之國，『白民』反音為婆羅門，不但西教從中國去，西人亦中國種。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烏能定之？埃及拜禽獸為上帝，一愚至此，宜乎西人以耶穌為勸教之祖。觀耶穌未出一千，其風俗如此之陋，可知其國一切制度皆教士所勸也」（皮錫瑞，2015a：831）。皮錫瑞於戊戌以前已經慢慢涉獵西學書籍和閱讀《時務報》，但講學也僅多涉獵史學和時事方面，對於當代湧入「民權」「自由」「平等」的概念毫無提及，亦鮮少見於日記討論。既如影響中國近代發展的嚴又陵《原強》和《天演論》也是戊戌政變以後才閱覽（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九月二十日，己亥年（1899）十一月初四日），對於「物競天擇」的看法乃「皆古今中外之通患，故百數十年必一亂，雖知之亦無以防之，所謂佛出世也救不得。論者反復曲為之解，以為有道可以長保太平，恐不過說得好聽而已」（皮錫瑞，2015a：1151）仍以通古今之變的角度看待，本質上仍是傳統經世致用的資源，並未如梁啓超般主張「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觀。

<sup>75</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正月廿五日。（皮錫瑞，2015a：768）林能士就此事認為學會為議院的設想在專制政治體制下必然失敗，因此皮錫瑞其後南學會的活動，亦始終集中在啓發官紳士庶的講學與藏書處上（林能士，1972：58）。實際上，皮錫瑞本就對政事不甚興趣，

要關心的非政治上的變革，而是打破學術的蕃籬，啓蒙眾人，希望能夠藉由講學來讓「氣太盛而不能虛衷受益」民風閉塞的湖南重新認識當今時局。<sup>76</sup>鹿門認為南學會的主旨是「廣開民智，聯合學派，但求開通，不求閉塞」。<sup>77</sup>故此，他望湖南諸生能夠「深觀今日時局有不能不變之勢，將一切利害得失，詳悉曉導愚民，庶使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不致滋擾生事」。<sup>78</sup>皮錫瑞決定加入南學會擔任學長登堂開講，主要的著重點仍是「欲以自強，先開民智。必智然後能強，必強然後能保種」<sup>79</sup>，是由下而上的社會啓蒙，重視引導者在維新變法的作用。皮氏明言出主南學會學長講學不過為「開民智，惟期發明吾道之大，稍除中外畛域之見，不明與之爭，而暗與之拒也」<sup>80</sup>，且「讀書窮理，將聖賢義蘊，瞭然於胸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期講明切究，庶幾有體有用，不為空談」<sup>81</sup>，昌明開通風氣。這種啓蒙與教化目的在於灌輸倫常觀念，將上層的思想、信念轉化為一般人生活中的「常識」，建立上下一體的共識，以保種強國（李孝悌，1992：60）。同時也強調維新志士應有先知先覺自任，去開導和喚醒朽人與愚民，以合群力自強：

---

對於自己非能「從政」而僅僅「議政」的職分有清楚的認知：「西國有議事之人，有辦事之人；吾之才分，唯能雲臺橫議，參贊國政，至於執而實行，非吾任也」自將心力投入偏重「啓蒙」的講學活動。見《傳記資料記皮鹿門先生》。（皮錫瑞，2015d：652）

<sup>76</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二月初二日。（皮錫瑞，2015a：777）

<sup>77</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四日。（皮錫瑞，2015a：824）

<sup>78</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廿九日。（皮錫瑞，2015a：872）

<sup>79</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二月廿六日。（皮錫瑞，2015a：809）

<sup>80</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四月初二日。（皮錫瑞，2015a：875）

<sup>81</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正月廿九日。（皮錫瑞，2015a：773）

諸君子當以先知先覺自任，喚醒一人，得一人之益，喚醒十人，得十人之益。務須平心和氣，開誠布公，釋其疑心，通其阻力。誰無天良，自然感悟。觀古今之興衰治亂，大抵奮發有為者興，因循不振者衰……若功廢於半途，事隳於中止，始於奮發，終於因循，一事無成，為四方所笑。<sup>82</sup>

無論是於江西經訓書院廣開風氣，還是湖南維新登堂講學，乃至後來投身湖南新式學堂的建設當中，「啓蒙」始終是其不變的初衷，認為而今「不能不馳域外之觀，更當開通人之心思，推廣人之耳目」。<sup>83</sup>最終這條看似作為最高理想的道路並未能如預期般落實。政治的打壓與時代洪流的激烈推進，不僅讓皮錫瑞的日常狀態天翻地覆，深陷文網而只能如退隱般蝸居塾伏杜門著書。皮錫瑞在時代的前端愈來愈激烈的思潮標準中被認定為過渡時期的「舊」派，生活習慣和閱讀世界遂重新回歸到傳統的範式。<sup>84</sup>此後歲月，皮錫瑞因深陷文網，懼怕受到政治波及，就連私人領域的日記也多加刪改：「凡駭俗語皆去之，然猶恐人有腫背之疑」。<sup>85</sup>既連晚年新式學堂任教也多次因日益劇烈的學生思潮，而多次辭去監督職位，堅決只教學而不任事。<sup>86</sup>桑兵論及晚清學堂學生思潮，指出

---

<sup>82</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廿九日。（皮錫瑞，2015a：872）

<sup>83</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正月廿九日。（皮錫瑞，2015a：772）

<sup>84</sup> 己亥年（1899）皮錫瑞潛心著書。不僅閱報活動於日記所載只有零星的五次，關注點也只在上述新聞，且回歸閱讀範圍回歸傳統典範，不見任何西學或變法相關書籍。

<sup>85</sup> 見《師伏堂日記》。壬寅年（1902）五月十一日。（皮錫瑞，2015a：1509）

<sup>86</sup> 見《師伏堂日記》，癸卯年（1903）四月十二、十二月初二、甲辰年（1904）二月廿九、乙巳年二月二十、十月十一、丙午年（1906）三月二十。（皮錫瑞，2015a：1637、1763、1803、1899、1989、2045）

監學作為專制制度的化身，會身不由己發生異化；習慣於經驗式舊學教育的教師，不能迅速完成知識結構的更新與調整的話，遂形成師生——前者仍以舊學為框架，後者則否定舊學的基本格局——發展趨向截然相反的衝突（桑兵，1995：198-199）。時態局勢日益劇變，世代矛盾漸漸擴大，新舊學的對立也愈顯尖銳。面對著最激進活躍的學生群體，皮氏亦如當時他說批判的諸多堅守舊學的「朽人」一般，再也跟不上奔湧而前的時代潮流<sup>87</sup>，最終黯然地淡出「啟蒙」的前線行列，固守於傳統舊學的價值世界。

---

<sup>87</sup> 張朋園認為從戊戌到「五四」期間的種種運動，知識分子的觀念是在不斷地改變：「他們尋找國家獨立強盛的方針，有見於統治階層模仿西方的技術的不成，進而推動制度的變革，最後發展為全面理想的探討。」這二十餘年間，知識分子被分成了兩個世代，前代受傳統的影響而不能遽然擺脫，後代手了西方式教育而已不再為傳統所範圍；兩個世代都在追求觀念並極力欲實行，從而形成內部的分歧斷裂，無法統一紛雜的想法。（張朋園，2002：10-11）這與皮錫瑞所面對時代遞變之下未能繼續以傳統經學倫理去落實其所謂「以教人之懇至，比於育人之恩勤」的教育理念，認為現今教育者乃「其嚴者失之束縛馳驟，則有教無育，尊而不親；其寬者失之放任自由，則有育無教，親而不尊」，師古法而云：「當知古人教法之善，情義兼盡，寬嚴得中，必如此乃能養育天下之英才」。這種凡事以古為訓的思想基調，顯然與新時代著眼未來而需重構傳統的激烈思潮存在著隔閡。見《師伏堂詩文補遺》，〈教育論〉。（皮錫瑞，2015c：555-562）。另《師伏堂日記》，戊申年（1908）正月十三日（皮錫瑞，2015a：2282）。

## 結語

作為傳統與新時代之間過渡的浮船，皮錫瑞對西學的接受轉變本就是從「閉塞」至「開通」。以過來人的經驗，他能深刻體會到思想的接受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皮氏觀察到：「今之言變法者，高者太高而難行，卑者太腐而泥俗」<sup>88</sup>，變法一事只能漸變以求成效，太高太急太盡都容易引起觸底反彈，此亦他所不能認同康梁變法的主要原因。若將康梁比作時代的「開創者」，皮錫瑞更像是湖南地區的「連結性角色」，接引且下滲維新派的思想主張，用以改變地方原先的思想氛圍（王汎森，2017：328）。當中「接受-傳播」的過程必定經過自我「再創造」的轉化。他變法思想中始終以「復興」與「啓蒙」為出發點，希望能夠漸漸點化民風閉塞的地方之士，從而達到諸生思想開通而同心。他尊孔教，賦予傳統學術新的義理詮釋以切時勢，都是為了能最大程度地廣泛讓聽講者接受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而不心生排斥。皮錫瑞未嘗不認為舊學已無用於世，然而裡頭恰恰有值得重新發掘，不得割捨的基體，用原有舊學的思想資源為框架，以解釋與理解新學，是一種有助於世相開拓、擴展思想世界「可以接受的方式」。湖南維新的新舊之爭的主要爆發點在於各有不可逾越的最後準則。西學作為外在工具為己所用，中學是不能盡除的立身之本，這是思想經過新知轉化的皮錫瑞一以貫之的思想核心。

---

<sup>88</sup> 見《師伏堂日記》，戊戌年（1898）三月十八日。（皮錫瑞，2015a：832）

「復興」之夢，乃針對現有因新知的出現而形成對立的訓詁八股之流毒，重拾漢唐以上的學術風氣與文化根基；「啓蒙」之夢，主要是啓迪新知，引導人們往標識好的道路前行。皮錫瑞南學會演講中的態度，是向西方「借光」，透過教育「以光照在所有事物，照在所有黑暗與未知的部分，必須讓所有的無知消失無形」（福井憲彥，2018：110）。可惜的是，皮錫瑞並未祛之「所有」，而是保留了讓黑暗能自行發亮的願景。「復興」爲道，是思想得以成型的框架；「啓蒙」爲器，是實踐的手段。在另一個角度觀察，以過渡時代前後的「思想-政治-社會」框架爲對比的準繩，皮錫瑞就如同處於黑暗中接受光明的人，探出了頭，身子大半截仍留在黑暗的影子之中。當面對更爲耀眼，勢要將黑暗燃燒殆盡的光——打倒舊制度的革命思潮，其就顯得畏首畏尾，形同他曾經斥之不願變的朽人。

以晚年定論而言，於新式學堂任教的皮錫瑞不無有志重振經學倫理，整頓愈加乖戾的學風，卻已有心無效也。學生羅元琨回憶皮錫瑞一二事言之「先生憂患之餘，似不願再觸當道之忌也。」<sup>89</sup>正指受戊戌政變波及而深陷文網，以及受學生革命思潮而毅然辭職二事。當鹿門悻悻然回歸訓詁經義的懷抱，晚年教學上亦無所突破發明，「士」至「新士」的思想轉向始終停留於過渡。無論是「復興」古學，抑或「啓蒙」新知之夢，都憾然遂成了一個轉型過渡時代下，小小地方傳統讀書人的未竟之業。

---

<sup>89</sup> 見《傳記資料·皮師回憶》。（皮錫瑞，2015d：633）

## 引用書目

1. [以] Adoni, H., & Nossek, H. (2011). Between the Book and the Reader: The Uses of Reading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Personal Psychosocial Needs. In Rosalind Crone and Shafquat Towheed (E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Volume 3: Methods, Strategies, Tactics*. (pp.49-65).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 [英] 安娜貝爾·布雷特 (2008) , 〈今日, 何謂思想史?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Now*〉, 大衛·康納丁 David Cannadine 編、梁永安譯, 《今日, 何謂歷史? *What is History Now?*》(頁 245-279), 臺北: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 [美] Aque, V.S. (2004). *Pi Xirui and Jingxue lishi*. Unpublished Doctor of Philosophy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4. [美] Carey, J.W. (200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5. [法] Chartier, R. (1992).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14th and 18th Centur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陳平原 (2008) ,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 晚清畫報研究》,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7. 丁平一 (1998) , 《湖湘文化傳統與湖南維新運動》, 長沙: 湖南大學出版社。

8. 丁亞傑（2001），《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爲》，臺北：萬卷樓。
9. [美] Fischer, R.S. (2003). *A History of Reading*. London：Reaktion Books.
10. [日] 福井憲彥（2018），《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新北：八旗文化。
11. 高瑞泉（2015），《中國的現代性觀念譜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2. [英] Highmore, B. (2002).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3. [美] Karl, R.E. (2002).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of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4. 李仁淵（2009），〈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213-2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5. 李孝悌（1992），《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6. [美] 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2000），鄭大華等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7. 林能士（1972），《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1895-189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8. 林學忠（2009），《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德] Lüdtke, A. (1995).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nd Who Are Its Practitioners. In Alf Lüdtke (Ed.), William Templer tran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p. 3-41).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 [美] 羅伯特·達恩頓 Robert Darnton 著，蕭知緯譯（2010），《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1. 羅志田（2014），《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2. [法]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1998），〈什麼是啓蒙？〉，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頁 422-44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3. 潘斌（2015），《皮錫瑞學術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4. 潘光哲（2014），《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5. [俄] Peperno, I. (2004). 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 *The Russian Review*, 63 (4), 561-573.
26. 皮名振編（1981），《清皮鹿門先生錫瑞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7. 皮錫瑞著、吳仰湘編（2015a），《師伏堂日記》（《皮錫瑞全集》第 9、10、11 冊），北京：中華書局。
28. 皮錫瑞著、吳仰湘編（2015b），《師伏堂詩草》（《皮錫瑞全集》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

29. 皮錫瑞著、吳仰湘編（2015c），《師伏堂詩文補遺》（《皮錫瑞全集》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
30. 皮錫瑞著、吳仰湘編（2015d），《傳記資料》（《皮錫瑞全集》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
31. 丘爲君（2018），《啓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啓蒙運動，1895-192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32. 桑兵（1995），《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
33. [美]蘇珊·桑格塔 Susan Sontag（2003），程巍譯，《蘇珊·桑格塔文集：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34. 蘇與編（1971），《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35. 許順富（2004），《湖南紳士與晚清政治變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6. 許紀霖（2011），《啓蒙如何起死回生：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7. 王爾敏（2003），《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8. 王爾敏（2006），〈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 年第 52 期，頁 19-51。
39. 王汎森（200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
40. 王汎森（2017），《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
41. 王鴻泰（2001），〈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象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2009 年第 12 期，頁 41-92。

42. 無名氏（1984），《申報（影印本）》（第四十八冊），上海：上海書店。
43. 吳仰湘（2001），《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長沙：嶽麓書社。
44. 吳仰湘（2013），《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45. 顏健富（2014），《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46. 楊瑞松（2005），〈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5年5月第23期，頁1-44。
47. Yung-teh Chow. (1953). Life-Histories of The Scholar: Chairman Wang. In Hsiao-tung Fei (Eds.),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8. 張灝（1978），〈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頁475-484。
49. 張灝（2006），《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北京：新星出版社。
50. 張灝（2010），《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
51. 張杰（2003），《清代科學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2. 張朋園（2002），《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53. [日] 佐藤慎一（2008），《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